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Finance Capital

金融资本

[德] 鲁道夫·希法亭◎著

李 琼◎译



史上最受欢迎的经济学经典

★★★★
超值
白金版

一部对金融资本危害和金融危机做出深刻分析的书，拥有它，让您对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的疑惑迎刃而解！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013967928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超值白金)

晏智杰◎主编

F038.1

04 (T2)

Finance Capital

金融资本

[德] 鲁道夫·希法亭◎著

李 琼◎译



北航

C1675568

F038.1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04(T2)

8207808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资本/ (德) 希法亭 (Hilferding, R) 著; 李琼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655-3

I. ①金… II. ①希… ②李… III. ①金融资本—研究 IV. ①F03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3632 号

金融资本

作 者 (德) 鲁道夫·希法亭

译 者 李 琼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3.625

字 数 392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 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

2 金融资本

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前 言

我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换句话说，我试图将对这些特征的分析纳入由威廉·配第首创的、在马克思那里达到顶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在我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特征就是集中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使得“自由竞争被扬弃”，另一方面则造成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正如我在后面将要阐述的那样，这种联系使得资本采取了其最高级也最抽象的表现形式——金融资本。

在这种情形之下，笼罩在资本关系上的谜团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金融资本有其独特的运动方式：看似独立，实际上却只是一种反映或表现；它会采取许多种方式，并且会和产业资本及商业资本的运动相对独立并分离。金融资本增长得越快，它对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对这一过程进行理论分析的必要性也就愈益迫切。不了解金融资本的规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经济和政策有任何科学的认识。

因此，对这些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就必须说明上述所有现象间的内部关系，从而也促使我进一步对银行资本以及它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的关系进行分析。我的研究也必须探寻使得产业企业得以创立的那些法律形式是否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这或许能帮助我解决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所导致的经济理论问题。但是，就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而言，目前我只能在其最成熟的形式中观察到这种在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基本形态中就有清晰体现的相同联系。由此，

2 金融资本

信用的性质与功能的问题就出现了，而这一问题又只有在厘清了货币的作用之后才能得到解决。弄清楚货币的作用问题还因为下述原因而变得更为重要，这就是：自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创立以来，尤其是在荷兰、奥地利和印度的货币制度形成之后，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现有的货币理论中都无法得到解释和找到解决的办法。正是这种情形使得克纳普虽然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货币制度在其实践过程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但却只能是抛弃任何的经济学解释，而试图以司法术语来取代。在他看来，这种做法虽然对于上述问题不能提供任何解释，也无助于科学的理解，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对此进行的中性的、没有偏见的描述的可能性。^①对这一货币问题作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必要性还因为以下原因而更显必要：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对作为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的价值理论进行经验检验；而且，也只有正确分析货币，才能使我们理解信用的作用，从而理解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间的联系的基本形式。

因此，研究的内容决定了本书的结构和框架。首先，我分析了货币问题，紧接着分析的是信用，然后是股份公司理论，以及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间的关系和地位的分析，这反过来又引致了对作为“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所的作用的考察。商品市场必须单独进行研究，因为它同时包含了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两种活动。产业集中的过程是与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紧密的联合相伴随的，因此，对集中的过程及发展方向，尤其是对其最高阶段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的研究，就变得更为迫切了。如果希望通过垄断的发展以及对商业周期的重大影响来“调节生产”，从而达到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那就必须对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理论部分的工作至此也告一段落。但考虑到上述理论及其今后的发展会对社会阶级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对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对几大阶级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政策进行了分析，这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经常被批评说其经济理论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① 参见克纳普的《国家的货币理论》。——编者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指责也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然而，我必须指出，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其分析对象的极其错综复杂，使得经济学成为所有科学理论中最困难的科学。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特殊处境——它被所有能够提供科学研究时间的大学排除在外，迫使他们只能在政治斗争之外的空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因此，不顾及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处境，将他们及其研究进展直接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是既不公平的，也缺乏对他们的创造能力的基本尊重。

经过最近一段时期关于方法论问题所进行的大量争论，即便不是出于为现行的经济政策辩护的目的，也应该对其作一个简短的解释。有人宣称，政策研究是规范性的，它最终还是由价值论来决定；由于价值判断不属于科学领域，因此政策问题的研究也不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在这里我无法就这种规范与规律即因果论与目的论之间的关系的方方法论之争展开充分的论证，而且因为麦克斯·阿德勒的关系，我更有理由省略这部分论述。麦克斯·阿德勒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一卷中对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充分而透彻的研究，^① 在此我只需指出一点就足够了，即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发现因果关系，即便是对政策的研究，也是秉持这一目的。与此同时，认识商品生产的社会规律，是我们得以揭示决定社会各阶级意志和意愿的决定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阶级意志是如何决定的是一项科学任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其理论一样，是独立于任何价值判断之外的。

因此，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虽然这种看法在内部和外部都广泛流行，但从逻辑上看，即便不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仅仅把它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考察，它也只不过是一种研究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解释的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试图将其运用于分析商品生产阶段。社会主义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其对商品生产

① 参见麦克斯·阿德勒的《社会科学关于因果关系和目的论的争论研究》（1904年）。——编者注

4 金融资本

社会发展趋势分析的结果。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包括认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既不是价值判断，也不是实际行动的指南，因为认识到一种事物的必然性，和以实际行动来实现这种必然性，二者是不相同的。当然，对于某些坚信只有依靠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将上述二者合二为一倒是很有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使掌握它的人具有持续的优势，而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当中，最危险的当属那些对社会主义有最深刻了解和体会的人。

另一方面，很容易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等同。阶级统治的维持依靠的是被统治者相信这种统治的必然性，认识到这种统治的暂时性这一特点，就可以成为推翻它的原因。统治阶级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产生无法遏制的厌恶情绪。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复杂性，也使得对它的研究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只有那些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或有害的人，才能承担这一工作。因此，虽然马克思主义拥有客观的逻辑，也摆脱了价值判断，但却因为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必然成为那些根据其结论并将最终获胜的阶级的思想财富；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并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相对立。与此同时，它还始终坚持着一切科学研究都应具备的特性——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普遍适用性。

早在四年前我就已经完成了这部著作的提纲，但不断出现的外部状况却使得写作过程一再被中断。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货币问题的那几章的写作在克纳普的著作出版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事后我只是对它作了很小的改动和增加了几处批判性的评注。这些章节的确也是本书中最困难的部分，因为遗憾的是就货币而言，无论研究的乐趣还是理论理解力，都是极易耗尽的，正如富拉顿也意识到的那样：

事实是，这不是一个能直接引起大众兴趣的课题，对其研究的进展过去是缓慢的，今后也将总是缓慢的。^①

① 参阅富拉顿的《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一书中的第5页。——编译者

情形在富拉顿之后也并未改变，因此，我不得不当即在此向缺乏耐心的读者保证：一旦你掌握了最初几章，本书的其余部分都将不再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难。

鲁道夫·希法亭

1909 年圣诞节于柏林 - 弗里德瑙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编 货币与信用

第1章 货币的必然性 3

第2章 流通过程中的货币 16

第3章 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 信用货币 45

第4章 产业资本流通中的货币 53

第5章 银行和产业信用 71

第6章 利息率 93

第二编 资本的动员 虚拟资本

第7章 股份公司 107

第8章 证券交易所 139

第9章 商品交易所 164

第10章 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 187

第三编 金融资本及其对竞争的限制

第11章 利润平均化的障碍及其克服 201

第12章 卡特尔和托拉斯 228

第13章 资本主义垄断与商业 234

第14章 资本主义垄断和银行 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 256

2 金融资本

第15章 资本主义垄断条件下的价格决定和金融资本的历史趋势 261

第四编 金融资本与危机

第16章 危机的一般条件 273

第17章 危机的原因 293

第18章 商业周期过程中的信用条件 304

第19章 萧条时期的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 320

第20章 危机特征的变化 卡特尔与危机 328

第五编 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

第21章 商业政策的重新定位 345

第22章 资本输出与经济区的争夺 357

第23章 金融资本和阶级 385

第24章 劳动合约矛盾与争端 400

第25章 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 416

第一编

货币与信用

第一卷

用書元而資

第1章 货币的必然性

人类生产共同体原则上可由两种方式构成。第一，它可以被人类自觉地加以调节。在这种方式下，无论其规模大小，即不论是自给自足的家长制家庭、共产主义部落，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通过其自创的组织和机构，代表社会意识来行事，确定生产的规模 and 方式，并把所生产出来的社会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在可用于生产的自然的和人力的条件既定的情况下，所有关于新产品制造的决策，诸如生产方法、地点、数量、可利用的工具等，都由家长、社会主义社会的全国或地方委员会来确定。前者可根据其个人经验和知识来决定其家庭的需要和可用于生产的资源，后者则借助于组织拥有的生产和消费统计资料等方式，全面了解社会的需要，辅之以自觉的预见，并根据其作为共同体意志的自觉代表这一身份的需要，来协调和组织全社会的经济活动。作为这个生产共同体的一员，每个成员都自觉地按照共同体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而中央集权则控制着共同体成员的劳动过程和产品的分配。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直接表现为社会关系，而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可以被视为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安排的而非个人意志决定的。因此，生产关系是由共同体确立并反映全体成员意愿的。

但是，第二，在缺乏这种自觉组织的社会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种社会里，社会成员被划分为无数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各自决定着自己的生产活动，生产活动变成了个人的事情而非社会活动。换言之，这些社会成员都是私人所有者，只是因为劳动分工发展的需要才会在相互之间发生联系。驱使他们相互联系的动力是商品交

换；也只有通过这种活动，这些被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分割为一个个独立单元的个体才会在社会中发生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交换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充当了中介物的作用，所以它才成为了经济理论的分析对象。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有交换，但这种行为只会发生在产品分配完毕之后，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而发生在个体之间的某种局部调整。因此，交换在这里只是对社会分配标准所进行的个人间的微调，是受主观情绪和考虑影响的个体交易行为，因而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分析对象。这种交换行为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两个儿童在幼儿园里交换玩具一样，其重要性根本无法与他们的父亲在商店里为他们购买玩具相比，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就后者而言，它是社会实现其生产共同体功能所需的总交换行为中的一个环节，只有通过这样的交换活动，生产共同体才能体现自己统一社会生产的角色，将被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割裂开的社会重新结合在一起。

就像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件上衣在交换关系内部所蕴含的意义要多于其外部，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交换在一种社会关系中的意义也会比在另一种社会关系中大得多。^①在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将社会中的人们分割成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和制约的个体时，交换才成为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力量，它执行着协调社会生产过程的职能。在自觉进行生产调节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中央权力机关自觉地计划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在哪里生产以及由谁来生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并使之在全社会得到彻底的贯彻和执行。总之，交换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资源配置的作用，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集权机关所执行的那些功能，即自觉地协调和管理生产、计划劳动过程等等。理论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归纳和总结那些决定这种类型的交换以及协调商品生产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规律，这些规律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当局在调节生产时所遵循的和实行的规律是一样的。这两种体制的区别仅仅在于：在商品生产社会里，规律不是以人类自觉的

① 由于交易活动的多样性，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寻求一个统一的交易规律是荒谬的。

意识直接规定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的,而是以自然规律的方式通过“自然的社会必然性”来发挥作用的。^①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交换还要为下述问题提供答案:生产究竟应该是由独立的手工业者来完成,还是由资本主义企业来完成?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伴随着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交换关系的变化中找到。交换行为本身只有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中才会有本质的区别,比如社会主义社会和商品生产社会之间。在商品生产社会内部,不管商品交换在数量上如何变化,交换行为在质上都是统一的。在这种社会中,体现在交换物品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客观社会因素构成了交换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交换的唯一基础是主观地等同这种平等的意愿。在这样的条件下,交换纯粹是偶然的,因此可能不会成为理论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它不能进行理论分析,而只能从心理上来理解。但是由于交换总是表现为两种物品之间的数量的比例关系,因而人们往往忽视了它们的这种不同。^②

由于社会商品流通自身的社会必要性,使得交换行为成为社会

① J. 卡纳(卡尔·热纳博士):《法律制度的社会职能》,载于《马克思研究》,第一卷,第2期,第108页。某些特定的社会规律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的社会体系中,这些社会规律会随着这种社会体系的消失而消失,并且只有在这种社会体系存在时才能引致其他事物的变化。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去认识这些社会规律。

② “他们(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私人物品交换的安排,因为这种交换实质上是一种个人交易。一次交换能够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是,交换双方都有可以交易的物品以及交换的意愿。以这种视角看待交易问题时,我们会发现交换其实是一种在所有的社会体系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只要有所有权存在的地方都会发生这种交换行为。

“无论是学校里钢笔和粉笔之间的交换,还是在两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成员之间的马匹和汽车之间的交换,这些交换行为都是私人之间的事情,与理论经济学没有任何关系。边际用理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通过把交换分析成为一种纯正的私人行为,来试图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希法亭:《论卡尔·马克思理论经济学的问题》,载于《新时代》,1904~1905年,第一卷,第106页)。